



风流与风骨

——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FENGLIU YU FENGGU

XIANDANGDAI ZHISHI FENZI QIREN QIWEN

◎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 诗名应共宦名清

◎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 季羨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 一九四九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二十世紀出版社集團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张国功 著

风流 ① 风骨

——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与风骨 / 张国功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12

ISBN 978-7-5568-1415-2

I. ①风…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279号

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张国功/著

出 版 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李一意
书籍设计	梅家强 曾 静 刘 展  先锋设计 FORWARD DESIGN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8-1415-2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87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序

PREFACE

有机会把自己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整理出一个集子，对我这样喜欢随意读书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快意之至的事情。

文中涉及的人物，按时间，包括现当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民国知识分子与共和国知识分子；按身份，我大体将其分上下两辑：文人与学者，报人与出版人。现当代知识分子往往角色多元，不能绝对地分得那么清晰单一。我想如果一个人专业“安身”之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就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这个不必多说。倒是说到民国/现代与共和国/当代，让我想起自己近年读书心路的些许变化，值得一说。

读书的风习多少是会带有代际特征的。对民国欲罢不能的喜欢，也许是我这一代“70后”读书人的一种宿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前所谓文化热与新启蒙风流云散，身边的同龄朋友一时间几乎都在读民国——说不清是殊途同归，还是跟风赶潮。其实如何看待似近却远的民国，特别考量着我们的眼光与定力，更考量着我们内心的人文态度。2011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册《长沟流月去无声——重温民国人和事》。在序中我曾经写道：“对于民国，我的基本判断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重新接续的大时代。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国民，对于国家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的记忆，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真实历史的前提。我以为，对民国的历史，我们应该抱持这种态度。从政治上讲，民国是短暂的、纷扰的、混乱的、下行的、未完成的，但从思想自由、精神生活与国民创造力上讲，它是丰富的、多元的、活泼的、生气淋漓的。三十年间，这个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现代国家、一种现代文明制度设计的大致框架，确立了追求现代化的方向。这很不容易。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身上的风骨，也在现代教育中学会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对常识的呵护、对理性的尊重，有着远比我们今天更多的丰富性与成熟度，因此格外让我们今天为之神往。”这大体代表了我对民国人与事的看法。就在这一年，我离开自己服务了十五年之久的出版业，回到母校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尽管大体仍是做着读书人分内的事，

但我对于今天的大学，委实有些陌生了。等到稍稍勉力适应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变化了不少。比如对于民国与共和国，与此前敏感于两者之间的“断裂”相比，近年似乎多少领悟到其间也未尝没有接续之处。再比如，今天常常被简单批判的共和国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如周扬、丁玲、韦君宜们，我们何尝又真正懂得他们人生的复杂、厚重与担当呢？还有，人过四十，我已经不太在意今天的“民国热”究竟是不自觉的美化还是平实的追忆了。从为人作嫁的编辑到教书育人的老师，稍微多了些阅历后，我发现在今天，出版也好，教育也罢，两者有着太多相通的问题。对社会徒劳的批判与袖手旁观的感叹，毫无益处。虽不敢说途远而日暮，但人生实易蹉跎，我越来越认同民国张元济、胡适、蔡元培们所奉行的沉潜做功、契性建设与对社会负责的卓犖识见，还有他们表面温和而内心却从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光风霁月的人格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坚持，相信功不唐捐，这是在欲说还休的当下我们最需要汲取的民国精神。张元济与胡适分别是我最为敬服的出版人与学者、教育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他们那种人生境界了。但有时静默想想，自己曾经像他们一样做过出版，再有机会从事教育，加上年轻时曾经参与的一段新闻工作，读书人能做的事，大体也就是这些了吧。感恩之中，我又常常勉励自己，何尝不应该像温润如玉的民国知识分子那样，多一点尽心尽力的做功呢！

给这本随笔取名为《风流与风骨》，多少代表了自己对现当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的神往。士为国魂，斯文在兹。一个时代“时风众势”的移人之力，我相信最突出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为文为人之中。希望这册小书的出版，既给自己过往的读书生活留一份纪念，也借以寄托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

人生充满缘分与意外。无数次地出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却没有想过有机会在这里出版一本自己的东西。对于以张秋林社长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同人的敬业与专业，我这个曾经的出版人经常感与惭并。谢谢并祝福他们。

作者 2015年11月

上辑 学者与文人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3

《巨流河》中的好老师朱光潜先生 /12

诗名应共宦名清 /19

世间已无叶公超 /29

吴宓与顾颉刚的身份尊严 /38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41

何兆武：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58

胡适·王淦昌·许良英 /63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68

于光远先生们的“一二·九”情结 /76

季羨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103

季羨林：亦真亦假的追忆 /114

李长之的六十九岁 /119

学人乎？文人乎？ /123

夜读鲁迅札记三题 /128

旧时王谢早无家——熊式一们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145

“两个丁玲”的冲突 /158

周扬与丁玲：欲说“左”右好困惑 /164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历史 /170

廖沫沙的打油诗：艰心出涩语 滑稽亦自伟 /174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181

无刺的马烽与多刺的时代 /191

王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 /206

下辑 报人与出版人

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215

书卷之外的张元济 /228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240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254

《大公报》与燕京大学：民间报馆与教会大学的思想关联 /260

自由之身与自由主义的一种底线——漫说几位旧年的知识分子 /269

周海婴与王芝琛回忆父亲：豁显历史的真实 /279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288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294

从萧也牧到吴小武 /299

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寿衣”与“小背心” /305

朱正：序跋文字的风骨 /310

“全集”古难全 /318

著作署名关义利 /323

且以后注改前误 /326

许觉民：更能消几番风雨 /331

曾彦修的良知与施燕平的软弱 /335

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341

上辑 学者与文人

SHANGJI XUEZHE YU WENREN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喜欢翻阅现当代学人自述、回忆录一类史料的有心人，常常会邂逅“李庄”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字眼。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得她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在杜鹃声声的山坳深处，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干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



岱峻《发现李庄》



李庄

战火淬砺的后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纲、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昇、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龢、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烺、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走出了吴旻、唐有祺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可以说，20 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可谓在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在国家板荡、风雨苍黄的 1940 年代，小小的李庄到底为中国的读书种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温情呵护？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坚持着他们韧性的学术担当与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为我们勾勒出了战乱岁月里中华文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旧年”的限定语，是因为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籍在舟车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暂栖他乡的乡思旅愁、时有发生之匪盗意外，连个人生活最低条件的衣食温饱，在李庄都成了莫大问题。至于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无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贫病的生活，宛如李庄时期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这位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诤诤之士，

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傅斯年在1942年4月18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至今读来令人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应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於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嫉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任职，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傅还特意说明：“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与傅终生谊兼师友的胡适曾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一口气用十余个“最”字对傅加以推许：“孟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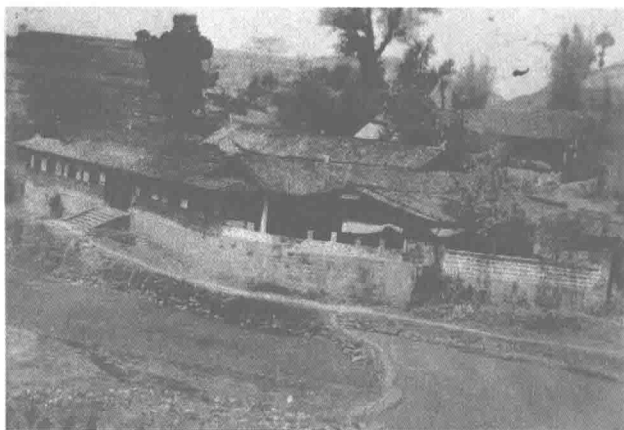


病榻上的林徽因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一事，有力地印证了胡的这些评价。而林徽因知道傅的侠义之行后，“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她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这就是风雨同舟共渡危艰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当时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最困难时每餐仅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甚至连稀饭都接不上，嗜书如命的他也只好卖书度日。

时穷节乃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如出版家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口号，以复兴被战火创伤的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情境中发挥了极大的精神砥砺作用。而对于蛰居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增加了他们问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与时局毫无关系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环境之清苦，并没有使这

一群读书人放弃本分的责任，他们仍然抱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追求。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的。董同龢在农家的神龛上研究汉语音韵，其《上古音韵表稿》及《汉语音韵学》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俅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战争与疾病夺去了李济两位可爱的女儿，但他仍没有搁下手头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干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东巴文化之父”李灿霖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偏僻的小镇上，“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好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每天读书抄材料。”（何兹全语）“大家平常欢聚，如一家人，若为一个小问题而互相争辩，必会面红耳赤，争个不休，最后推出一个‘真理’双方同意，才能停战。”（董



1942年的李庄栗峰书院

作宾语)静虚的边远环境里,依旧流溢着深沉的学术热情与不绝的民族精神。此处国家板荡、民生凋敝之时世,虽说学者从政一度成为民国的潮流,但坐冷板凳专心问学仍是李庄知识分子的首选。中研院拟设民族学研究所,拟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执掌。闲云野鹤的李先生一向信奉“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对朋友傅斯年的敦请,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立即对李躬身作揖:“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对学问的专笃和傅对学人的理解,都令人肃然起敬。政府延揽熟悉民族文化和边政事务的知识分子,拟任命凌纯声为新疆省党部执委。朱家骅屡次来电敦促,蒋介石亦拟接见,而正忙于苗族调查的凌坚不为动,对朱“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的通牒,凌不惜提出“引咎悬辞本职,以谢我公”,不惧权贵。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职责。

这种韧性的个人坚持,汇聚成中国知识界坚毅的力量。季富政先生在《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情怀——四川民居研究的开拓与奠基者刘致平》中说:“一个学术团体,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另一个战场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如战士搏杀,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拼命磨砺民族精神之剑,其闪闪寒光令侵略者胆战心惊。正是这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以炎黄子孙的孝道、民族的责任与道义,用自己的专业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去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辉煌历程以及她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这是刺向侵略者灵魂深处最犀利的锋芒,是最动摇侵略者精神堡垒的重锤……漫漫长夜,孤单人影,寝食草草,路途艰危,如果没有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对民族文化海

1942年5月国立同济大学在李庄举行三十五周年校庆(图为校运动会)



一般的眷恋深情，是不可能产生这钢铁般意志的研究行为的……”李庄时期知识分子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他人的敬重。1941年，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到李庄做客，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梁氏一家艰难困厄中献身学术的热情，他由衷地赞叹：“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强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

“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重教化、讲斯文的民间传统，使得当“中原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古镇李庄却在长江边为读书人热情地铺就了另一张素朴却不失温情的书案。“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李庄供给。”一纸求贤若渴、热情相邀的电文，流露出小镇对“下江人”知识群体的信任与尊崇。中央学术机构迁至李庄的一个重要纽带，是以罗南陔为代表的当地开明乡绅。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更有意思的是，逯钦立、李光涛等年轻学人，因为时机与缘分，还成了李庄的“姑爷”。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在几十年后，时为北大教授的周祖谟先生到南京史语所旧址寻访。陪同的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没有太大成就的？”周回答说：“没有。”鲁问：“为什么？”周说：“进来时都是精